

# 《大英国志》与晚清国人对英国历史的认识

邹振环

(复旦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433)

[摘要] 1856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了慕维廉编译的《大英国志》,为近代中国文化人带来了大量的关于英国历史的知识信息。本文通过对《大英国志》译本的分析,译者蒋剑人在翻译中对英国历史的理解,以及《大英国志》在晚清的流传和影响,指出该书为晚清中国人正确认识有关英国历史,提供了最新的、最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使中国人第一次全面地了解了英国的政体演变、历史沿革和文化成就。该书在近代中外史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 《大英国志》 慕维廉 蒋剑人 史学交流

[中图分类号] K091,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89(2004)01-040-010

1856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了慕维廉与蒋剑人编译的《大英国志》,为近代中国文化人带来了大量的关于英国历史的知识信息,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该书未受到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即使在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中,几乎没有论著注意分析过该书的翻译与影响。本文通过对《大英国志》译本的版本、体例与所蕴涵的知识信息的分析,译者慕维廉和蒋剑人复在翻译中的不同认识,以及《大英国志》在晚清的流传和影响,指出该书对于晚清中国人正确理解和认识英国历史信息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该书在近代中外史学交流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 一、《大英国志》版本与体例

《大英国志》是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sup>①</sup>据英国托马斯·米尔纳(T. Milner)原著编译的,咸丰六年(1856)墨海书馆刻印,八卷本,有英文序文;咸丰十年(1860)有八卷本的续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墨海书馆的续刻本两种,一为二册本,一为四册本;扉页均题为“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江苏松江上海墨海书院刊”,两书均有“续刻”,所记下限至一八六零年正月事。两者文字完全相同,惟二册本无地图,四册本卷八“地理志略”附有《苏格兰图》和《阿尔兰图》。光绪七年(1881)有上海益智书会版木刻本<sup>②</sup>。以后还有《西学大成》本和《新辑各国政治艺学全书》本等。1881年上海益智书会修订版与1856年初版相比,在内容和文字上有较大的改动。《西学大成》本和《新辑各国政治学全书》收录的大体是根据1881年上海益智书会修订本的内容。

慕维廉在《凡例》中称该书以《大英国志》为书名,是受到宋代学者所撰《大金国志》的启发。在

[收稿日期] 2003-10-8

[作者简介] 邹振环(1957—),男,浙江鄞县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关于慕维廉的生平和著述可参见英人艾约瑟《慕维廉先生轶事》,载《万国公报》第143册,1900年12月;英人李理斐译、温和光述《慕牧师木铎记》(The Life of the Rev. William Muirhead, D. D., for 53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 of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22—1900) by his widow),广学会1909年版,页1—6。邹振环《慕维廉与〈新工具〉》,载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邹振环《慕维廉与中文版西方地理学百科全书〈地理全书〉》,载《复旦学报》2000年第3期。

② 该版八卷二册本,前有慕维廉1880年英文序言,共224页。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藏有该版。日人八耳俊文《清末西人著译科学及相关汉籍和刻本及其所在地目录》(载日本化学史学会编辑《化学史研究》第22卷第4号, No. 73, 1995年12月,页69)所提到的1881年上海版,可能就是该版。

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支配下,中国有不少书是在朝代前冠之以“大”的,如“大唐”、“大元”、“大明”。晚清“大英”一词的出现,最初是包含有与“大清”抗衡的意思。1840年7月4日英国侵略者给定海县中国守军下的战书中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大英国”,而定海县提督则认为其书函“词甚悖逆”,<sup>[1-p239-240]</sup>。传统中国学者编写的汉文文献内的“中国”、“华夏”才是“世界”的中心,清末中国人开始真正了解并接受“万国”的概念,但仍认为中国是“天下之最大”,中国文化为“天下之最高”,于是仍自称“大清国”,为了和“大清国”平等地对应,英美教士也在自己的国家名称前加上“大”字,于是就有了《大英国志》、《大美联邦志略》这样的书名。

从译本体例内容看,这是一部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王朝更迭史。原本七卷,译本改成八卷。卷一为开国纪原、英降罗马纪;卷二英萨索尼朝;卷三英诺曼朝;卷四北蓝大日奈朝;卷五都铎尔朝;卷六斯丢亚尔的朝;卷七北仑瑞克朝。据慕维廉的英文序文,前七卷是译自与慕维廉同时代的英国历史与地理学家托玛斯·米尔纳的原著《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该书是一部描述从部落时代到克里米亚战争典型的英国编年史,可能是1856年前由Religious Tract Society出版的。卷八是由关于职官、宗教和地理等八种“志略”组成,资料来自“Chamber's 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等书。该书的刊行需要很大一笔经费,与《地理全志》一样,该书也是由在广州的著名鸦片商人颠地(Lancelot Dent)出资刊刻的<sup>①</sup>。

慕维廉深知中国史书中地位最高的是纪传体正史,作为一部英国王朝史,理所当然应当与中国的正史相对应,因此他在该书《凡例》中特别指出:“英史体例与中国不同,中国设立史官及起居注、实录,而易代修史,具有章程。泰西诸国无史官,士民皆得纪载国事。兹依英士托玛斯·米尔纳所作《史记》译出,悉从原本。观者勿以中国体例例此英史也。”编年体的缺点是难以反映经济制度和文化状况,也很难一下子看清历史人物的活动,因此慕维廉除指出中西两种史书在“史官纪事用时王年号”和“耶稣编年”的方法上不同外,也指出“中国史记列传用纪事体较详,本纪用编年体较略”。而“英史有本纪而无列传(名人事迹具见他书),一代政教兵刑,事无大小,悉统于纪。体例既异,文字遂繁,观者勿讥其凌杂无节也。”为了与传统的中国正史纪传体相对应,慕维廉又利用其他相关资料翻译编辑了类似正史“志”,作为第八卷,“略述职政地理等志”的内容。职政、刑法、教会、财赋、学校、兵、农商、地理八种“志”的名称,也留下了中国传统纪传体“志”的痕迹。全书前列维多利亚女王世系表,加上英国两幅版图,也算本纪、表、志、图具备,慕维廉称此书属于“本纪体”。《凡例》中还特别说明:将编年史改为“本纪体”,但其中克伦威尔难以列入本纪,于是称:“格朗,有王者之权,亦未践王位,不得入列王本纪,易其名曰‘记’,从史家变例也。”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编译历史著作,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将中外历史进行比较,慕维廉在《凡例》中写道:“中国两汉而后,易后朝代修前代之史,二十一史,人异世殊,各自成部,《英志》则以国以来,遥遥二千年,共成一史,列代兴亡之故,自古迄今,了如指掌。”(《凡例》)这一“本纪体”虽算不上是什么大创新,倒也独具一种中西混杂的色彩。

## 二、《大英国志》蕴涵的知识信息

慕维廉在《大英国志·凡例》开篇,就特别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政体:“《史记》皆以国政为纲领,天下万国,政分三等:礼乐征伐自王者出,法令政刑治贱不治贵,有国者西语曰恩伯腊(译即中国皇帝之号),如中国、俄罗斯及今法兰西等国是也;以王者与民所选择之人共为政,君民皆受治于法律之下,有国者西语曰京(译即王,与皇帝有别),泰西诸国皆有之,而英则历代相承,俱从此号;又有无帝无王,以

① 参见慕维廉《大英国志·英文序文》,序文写作的时间为1856年9月10日,原本人没有见过,此序文复印件由日本爱知大学荒川清秀教授提供,特此鸣谢!“Religious Tract Society”建立于1799年,是主要出版和传播有关基督教文献的专门机构,其出版物有大量是英格兰人所撰写和编辑的关于福音主义的读物。慕维廉的《地理全志》和《大英国志》都采用米尔纳的著作作为原本进行翻译,显然是因为他们他们在解释历史和地理问题上持有相似的基督教神权意识。通过因特网查检,“Chamber's 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一书的资料系来自《钱伯斯英文版百科全书》的相关内容。

百姓推立之一人主之, 限以年数, 新旧相代, 西语曰伯勒西敦(译即为首者之称), 如今之合众部是也。”他认为通过这部英史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英国法律和教会的作用, “英史记载, 首重法律, 必君相与巴力门上下两院, 会议乃行。累朝事, 善者增修, 不善者删改, 可一览而得其要领云。”<sup>[2]</sup>

在卷一的“开国纪原”中, 作者指出“大英”(本名比利敦)在欧罗巴西北, 海水环之。其民种初名‘瑟尔的’, 后有‘丢度尼’种, 入而居之。而‘瑟’种至今日衰, ‘丢’种日渐强盛。英之先民各分部落, 部有大小, 父老集议, 或推一人主之, 间用教士, 亦操大权。英俗互相猜夺, 心力不一, 故不能御外侮。每于小市集, 筑墩掘沟, 以备不虞。”<sup>[3-1-3]</sup>“英降罗马纪”中称: “该撒, 罗马将兵者也, 主其国政, 自负勋名, 欲勤远略, 且怒英人曾遣兵助法, 故决计伐英, 率兵船八十艘, 步卒万人先往, 骑兵后至”, 经过战争, 最后“英人乞降”。恺撒去后的九十七年, 英人模仿罗马的制度礼仪, “风俗渐改, 窳陋一新”。罗马人占领不列颠历时将近四百年, 作者在这里特别强调了基督教的作用: “罗人在英日久, 英俗为之一变, 国政日趋于善, 互相婚娶, 孳育新民, 人心廓然向义。昔之异教犷悍者尽去之。于是英罗之人, 渐为耶稣门徒矣。”“罗人在英, 其大事为传耶稣福音之道”, 以后尽管“英人背罗”, 而“基督之教, 百姓咸信。”<sup>[3-1-3-8]</sup>卷二“英萨索尼朝”记述了伯勒瓦尔大七王纪、以格伯十五纪、大尼朝的加纽的哈罗德第一哈的加纽纪; 萨索尼中兴时代的义德瓦(今译爱德华)第三哈罗德第二纪。卷三“英诺曼朝”分维廉第一维廉第二纪、显理(今译亨利)第一纪、士提反(今译斯提芬)纪。卷四“北蓝大日奈朝”是从1154年开始的, 英国史今译“普兰塔哲内特朝”或译“金雀花王朝”; 译本分为显理第二纪、力查第一纪、约翰纪、显理第三纪、义德瓦的第一纪、义德瓦第二纪、义德瓦第三纪、力查第二纪、显理第四纪、显理第五纪、显理第六纪、义德瓦第四纪、义德瓦第五纪、力查第三纪。上述四卷基本上是公元前55年恺撒入侵不列颠到都铎王朝建立约1500年间英国的古史。

卷五“都铎尔朝”分为显理第七纪、显理第八纪、义德瓦第六纪、女王马利纪、以利沙伯纪。英都铎王朝前后持续了118年, 这是一个英国资本主义开始自己的原始积累时期。“都铎尔朝, 国中商贾, 始开海道, 贸易往来, 多造战舰, 水师用炮。在明中叶, 其始置于船面, 后穴舱架炮, 其孔颇小, 施放无准, 反害船身”。以后通过技术改进, 到“以利沙伯(今译伊丽莎白)时, 水师渐盛, 有事辄借商船用之, 海口多商邸(俗呼洋行), 每邸备船, 较昔尤美。故此时兵船为后世所取法。拓地开疆, 亦始于此。”<sup>[4-1-46]</sup>1558年以利沙伯继承王位, 她允许“国人以国语读圣书, 正教日兴”, 建立了英国的教会。在她统治十二年的时间里, “民数四百万”。仅“荷兰、比利时人多迁徙入英, 民数骤增”就有十五万人。显理第七时“始造纸以丝毛”; 以利沙伯时“始织袜, 画技传神, 冠诸国。治格致学者, 精微真实, 历代弥详。而此时倍根所著书, 使后学愈知考察象纬术数。惟医者未能深究病源, 熟观藏府[脏腑], 喜立异方, 尝试而已。……都铎尔朝末年, 语言文字变化与今略同。时刊印希腊罗马书, 讲明切究。俾国中文教日兴, 当以利沙伯时, 所著诗文, 美善俱尽, 至今无以过之也。儒林中如锡的尼、斯本色、拉勒、舌克斯毕、倍根、呼格, 皆知名士。兴教事者实繁有徒, 至今人犹赖之, 所著书不尚文采, 切于事理。”<sup>[4-1-49-50]</sup>此处提到“舌克斯毕”和“倍根”当是指莎士比亚和培根。“锡的尼”即英国诗评论家锡德尼(Philip Sidney, 1554—1586), “斯本色”即英国诗人斯宾塞(Edmund Spenser, 1552—1599); “拉勒”、“呼格”不详, 有可能是剧作家马洛(Marlowe, 1564—1593)和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不准确的音译。

卷六“斯丢亚尔的朝”, 即1603年开始的斯图亚特王朝。其中包括1603年至1688年“光荣革命”为止的80多年的英国史事。分惹迷斯第一纪(今译詹姆斯一世)、查尔斯第一纪(今译查理一世)、记高门事、阿力弗格朗记(即克伦威尔传)、力查格朗记(即克伦威尔的儿子理查·克伦威尔小传)、高门中兴记、查尔斯第二纪、惹迷斯第二纪、众议士议立君位、维廉第三马利第二纪、女王安纪。在“查尔斯第一纪”中详细地记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过程。一六三七年“苏之都城(即苏格兰)壹丁不(今译爱丁堡)大乱, 叛者细民居多, 乡人效尤亦叛, 卒之一国上下, 定意仇视新法, 王强制其民等于叛逆, 于是国人益合而誓立教约, (组织‘庄严同盟’)名曰‘格惟难德士’, 为民得

自主之教，教中以是为律，而‘以比斯哥巴之法’遂废，王闻而始听之。”<sup>[5-p19]</sup> 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格朗 围困了国王所居的“牛马谷”（今译牛津），查理一世投降。“格朗 有文武才，威名大著，知兵必训练乃精，选健儿教以战阵，部勤悉按兵法，毋许抄掠，以此师出有功，军中号曰爱伦赛德士（华言铁身）王之军士。”<sup>[5-p27]</sup> 在详细地描述了查理上断头台的过程后，该书有一段感慨：“王首堕，国人观者长吁，竟以巾来渍王之血，军士麾之。查尔斯王不得其死如此，读史者至此，叹为人君者，固不可逞欲而妄为，顾古今悖乱之事，未有甚于此者也。”<sup>[5-p33]</sup>“巴力门议立君位”一段虽然不长，但其内容一定令当时中国读者感到震惊，因为议会中的“多利”（今译托利党）和“辉格”（今译辉格党）竟然来讨论国王的候选人。1689年的临时议会最后将英国王冠献给维廉和马利二人。

卷七“北仑瑞克朝”，即历史上的汉诺威王朝。分若尔日第一纪、若尔日第二纪、若尔日第三纪、若尔日第四纪、维廉第四纪、今王维多利亚纪；若尔日第三纪写道：“国中器用，机巧甚至精，使百物流行四方。民间纺织，工省而速。一千七百六十四年，棉花入英者三百八十七万斤；一千七百九十年，三千一百四十四万斤；一千八百年，五千六百万斤。后其数多不可胜计。国中诸事有益者，莫妙于火轮船。制是器者，其人瓦的（今译瓦特）。一千七百六十九年，始开煤矿，中有水，以火轮器汲之。一千七百八十五年，始用火轮器以织布，民间大有裨益，实上帝之恩也。”<sup>[6-p19]</sup> 这里解说了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一系列“技巧”应当包括哈格里夫发明的新式纺车、阿克奈特发明的织布机，特别是詹姆士·瓦特1769年改良蒸汽机初步成功，获得专利证。但该书还是没有忘记把这些功劳归之于上帝。

17世纪是英国历史上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是时行海觅新地者，其人一拜仑，一瓦力斯，一加德力，一古克等，周行地球。古克最著名，直至南半球高纬度处，周行审视而知地理之士所云：南方更有大洲者，谬也。用医术治舟人，使不疾病。一千七百六十九年，至南平洋，测金星过太阳面定新西兰岛，得澳大利亚东海滨，为英今之属地。时英人已失亚墨利加，以罪人遣戍至彼狱中，宰相束手，见古克著书中有是土，乃分遣犯人至此，生育保聚。一千七百八十七年，始以舟载犯人往，舟行八日，居于悉尼，至今为澳大利之一大都会。一千七百八十八年普鲁斯远行，至亚比西尼，探尼罗河源。一千七百九十五年，蒙哥巴格自冈比亚河，至乃日河，其地在亚非利加。”<sup>[6-p19-20]</sup> 拜仑（J. Byron）是英国伟大诗人拜伦的祖父，他在1740—1744、1764年先后完成了两次环球航行。在赤道的波利尼西亚他发现了吉尔伯特群岛的一些岛屿，其中一个岛屿因此被命名为“拜仑岛”。1766年他第二次环球航行回到英国后不久，英国又派出了两艘船前往太平洋探寻南部的新地，这两艘船的指挥官是瓦力斯（S. Wallis，今译华里斯）和加德力（P. Carteret，今译卡特利特），他们一起穿过麦哲伦海峡后分手，瓦力斯在1767年6月发现了塔希提火山岛等，他还因为成功地运用观测月球与其他星辰之间角距的方法确定经度线而载入世界航海史册。卡特利特在搜寻所罗门群岛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珊瑚岛屿，并将其命名为“卡特利特群岛”。古克（James Cook，1728—1779）是英国著名的航海家，1768—1770年的首次航行发现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东部海岸区；1772—1775年完成了南极的航行并穿过南极圈；1778—1779年第三次航行再次发现夏威夷群岛，他的环球航行基本上廓清了关于南半球大陆分布的假想。有关尼罗河的源头是英国探险家普鲁斯（James Bruce，1730—1794，今译詹姆斯·布鲁斯）发现的，为此他在1790年完成出版了五卷本的《尼罗河源头发现行记》。<sup>[7-p612-711]</sup>

这一时代的科技、学术和艺术成就，卷七中也有所交代：“是时英之士人，学问更精。一千七百八十一年，天文士黑尔舌（John Frederick William Herschel，1792—1871，今译赫歇尔）测得新行星，名‘于拉纳士’。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作大远镜，能测前所未见天空列宿。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医士日纳尔（Edward Jenner，1749—1823，今译詹纳）立一《医痘法论》（即《天花接种因果的调查》）。物质之学，著名者曰伯利斯特力（Joseph Prestley，1733—1804，今译普里斯特利），曰加文的使（Henry Cavendish，1731—1819，今译卡文迪许）；作中外史记者，曰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作诗

歌者曰哥德斯米(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 今译奥立佛·哥尔斯密司)、曰巴尔纳斯(? 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 今译拜伦)、曰苟伯(George Crabbe, 1754—1832, 今译克莱普)、曰加拉比(Thomas Campbell, 1777—1814, 今译甘培)。能刻镂者曰倍根(John Bacon, 1740—1799)、曰邦斯(Thomas Banks, 1735—1805, 今译托玛斯·班克斯)、曰弗拉斯曼(1755—1826, 今译法兰库斯曼);能绘画者,曰来纳德斯(Sir Joshua Reynolds, 1723—1792, 今译乔舒亚·雷诺兹)、曰老米尼(Romney, 1743—1802, 今译罗姆尼)、曰斯德(Benjamin West, 1738—1820, 今译威斯特);著书述国政商贾贸易事者,曰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sup>[6-p20-21]</sup>

最后部分是“维多利亚纪”。这一部分初版本叙事至19世纪50年代中期,后又出修订本,未附《大英国志续刻》,略记1856至1860年英国在海外的扩张活动,其中有部分记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内容:“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十月,波斯人袭取希拉,其他在阿富汗。英人闻之,即欲率师而伐焉。十二月英师压其境。一千八百五十七年二月,英与波斯战,波斯败绩。三月同盟于巴黎斯。……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五月十九日,英法兵艘进北河,六月二十六日,有和约书定于天津。八月二十六日,英人在日本京城立和约,定于六口通商。……一千八百六十年正月,英法各调兵进中华,三月英钦使大臣卜致书于华臣,定和议。华臣请和,于十月二十四日,中英重立和约。”《西学大成》本的卷七部分的下限一直记述到一千八百八十一年,称当时英国的人口:“在英伦威尔士境内者共人数二千五百四十万,苏格兰三百六十六万,阿尔兰五百三十六万,人数共三千五百四十万人。”“国中治火轮车路甚多,英伦威尔士计一万七千路(修订本改为‘三万七千路’),苏格兰三千路(修订本改为‘八千路’),阿尔兰一千八百路(修订本改为‘七千路’),凿山开洞,建铁桥于米乃海峡及冈威河,大船樯桅直从桥下过,制甚奇异。电气铁线,自伦敦至各关隘咸置,亦越海底至各处,远近于天下皆不能限。英地土产甚益于民,铁铅铜锡及煤矿最多,百姓日用,遂以富强。气候寒暖适中。国于濒海,商舶往来,四方物产辐辏,国政民得自主,事无窒碍。于是英国莫强焉。欧罗巴、亚西亚、亚非利加、亚墨利加、澳大利群岛,皆有属地,共三十余部,天下未有如是之大国也。”<sup>[8]</sup>

作者的编纂方法是继承了18世纪以来英国史学家普遍采用的编年史的传统,由近及远,略古详近,上述六卷构成了从恺撒入侵以来完整的英国编年体通史。我们注意到从英国休谟开始,就主张要扩大历史写作的范围,在他的编年体《英国史》中,除记载政治、军事等重大事件外,还记录了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及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具有社会文化史的因素<sup>[9-p157]</sup>。米尔纳的《英格兰史》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在描述王朝更迭的历史演变中,非常注意科学与文化的内容,但慕维廉仍感到米纳尔《英格兰史》这方面的不足,而且担心这种“一朝政刑之制,总叙于每卷之末,与中国史例不符”<sup>[2]</sup>,怕中国读者不易接受,于是他又参据其他历史资料编写了经济文化方面的“志略”,作为第八卷。所谓“卷八”,分职政、刑法、教会、财赋、学校、兵、农商、地理八志略。详略不等,兵志较略,地理较详,一种志略往往只是强调一个方面,如“学校志略”重点介绍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英国自昔有大书院二所,视中国太学,其一在阿斯福(Oxford),其一在堪比日(Cambridge),皆有五六千人,读书其中,凡象纬、舆地、性理、律历、政事、辩论、格物学咸备。每年课其高下而升擢之。贫无赏者,富家助其膏火之费。其中各有小院,阿斯福二十四,堪比日十七。此外有博通古今语言文字之学,有兵法之学,有公会之学,有教会之学,其他私立小学者无算。综计英之入学者,一百五十人中十人焉。小学先习言语文字、算数、地理、史学、医学,至天地性理之学,涉猎其粗者。而人才实聚于太学,巴力门设一议会曰劝学之会,捐施资俸,度地多寡,开立学舍。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共捐十万金。阿尔兰大书院三所,余自立者颇多,学者十人中一人,凡六十余万人。苏格兰大书院六所,余自立者颇多,学者计九人中一人,凡二十二万人。”<sup>[10-p8]</sup>修订本又增补了新的内容:“近上下两院,议定各处幼童俱入学肄业,民间捐银以助建立学塾,延师修俸,在大英学院,诸生共二百九十八万,计每岁费用西银三百七十万。”卷八资料下限为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农商志略”中记述这一年“他国货物通行三千六百三十兆西银;本国货物出口一千九百十五兆,较前更繁盛焉。”<sup>[11-p11]</sup>

慕维廉在编译此书的过程中,极力突出其基督教的神权意识,他在自序中写道:“盖英之创始何日,史无可稽。云作史者衡量古今盛衰升降之势若何,其理若何,有以知所以盛衰升降者原于上帝。上帝之手不特垂于霄壤,抑且以天时人事翻之覆之。俾成其明睿圣仁之旨。读者勿徒览战争之故,兴亡之迹云尔已也。史册所载,天道微而显,上帝以定律治人,鉴其善恶,降以罪福,天下人人能博稽载籍,感发天良,悔过迁善,斯为要理。”<sup>[12]</sup>在卷七的最后总结中,该书指出只有遵循上帝的旨意,国家才能翌日富强:“盖上帝自有权衡,俾国家祸败立见,惟时时勤事上帝,则藉其物产之丰,即后日亦可更兴,如使国政不遵天教,众议士不奏圣书,学士日出危言,商贾趋利若鹜,百姓善者少,恶者多,正恐上干帝怒,而国家将衰。惟国中政教、议会、商市、民居,事事悉秉公义,可知即有敌国外患,上帝荣光丕著,必能佑之矣。”<sup>[6-51]</sup>慕维廉也公开声明编译此书旨在突出基督教新教在英国历史中的作用:“英史所载教事,别类分门,互相消长,设科立轨,略有异同,要之崇奉一耶稣天主,其他异端,不得而入焉。”“英史尤重教会,国中大政,无事不与教相关,故叙述教务,不容简略,且天下万事,皆上帝主之,作史者必首言上帝焉。”<sup>[2]</sup>

### 三、蒋剑人的历史译名与历史认识

《大英国志》文字典雅流畅,显然是由中国文人帮助润饰过。慕维廉在英文序文中也说明“此书是在杰出的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完成的”,但没有具体提及帮助者的姓名<sup>[13]</sup>。王韬在《啸古堂诗集序言》中称自己曾帮助慕维廉“改削《英志》及《地理全志》上下编”,后来又推荐蒋敦复作为慕维廉的翻译助手。《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也指出:《大英国志》的译文水平之高受到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慕维廉的合作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海文学界的主要名人蒋敦复的技巧<sup>[14-624]</sup>。也有学者称《续刻》部分的内容是有沈毓桂协助完成。<sup>[15-p152]</sup>

编译者蒋剑人(1808—1867),初名金和,后易名尔谔,更名敦复,字纯文、克父,号江苏老剑,江东老剑山人,又号丽农山人,江苏宝山人。幼时有神童之誉,据说六七岁时,塾师指几上“墨”令对,他即应声曰“泉”。塾师以为未工,他说:“白水”对“黑土”,何不工之有?<sup>[16-p27]</sup>蒋剑人称自己9岁就读完了十三经,十余岁他与家人负气出游,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状貌不扬但性情奇傲,被江淮间人名为“怪虫”。后曾一度削发为僧,名“妙尘”,号“铁岸”<sup>[17]</sup>。王韬在《瓮牖余谈》中称其“顾僻嗜阿芙蓉膏,有所得辄以供养烟云,坐是奇穷,青衫蓝缕,几至纳屣踵决。然每至夤夜,一灯咿唔,读书自若,弗悔也。”虽穷困潦倒,但时人仍将他与李善兰、王韬一起誉为“海天三友”<sup>[16-p29-30]</sup>。他曾“发奋著书,虑岛夷终为中国患,搜罗遐陋人著述,考定地球四洲形势,作《寰镜》一书,凡十六卷。”

咸丰二年(1852)秋天蒋剑人为了躲避太平军而到上海“卖文自给”<sup>[17]</sup>。咸丰壬子仲冬(1852年底或1853年初)与王韬相识,“始见之于沪市,倾盖订交,执手如旧相识。”<sup>[18]</sup>王韬深服其才华,认为“亦人杰矣哉!”不仅请他为自己的《瀛 杂志》写序,而且听说慕维廉正在编译《地理全志》和计划编译一部英国历史,便“力荐其才,遂为西人司笔削。”<sup>[16-p29-30]</sup>蒋剑人在《自叙》中则把《大英国志》的问世归功于自己诱导的结果:“山人与英吉利人游,思得彼国要领,诱之出国史,翻译成书。由是英国二千年来治乱兴衰,山川、疆域、财赋、兵刑数大端了如指掌。尝自谓吾他著述或不足传,惟《英志》及《宫调谱》二书必传无疑,《英志》即此书。”<sup>[17]</sup>他对外国历史传记一直有很大的兴趣,曾为《六合丛谈》撰写过罗马统帅该撒(今译凯撒)和美国总统华盛顿两位海外名人的传记。据王韬说他还在慕维廉《大英国志》的基础上“自撰”了《英志》八卷,可惜“未授手民”<sup>[18]</sup>,所以我们无法了解其中的详细内容,当时见过此书者对其评价甚高,王韬称该书“词简意赅,实为佳作。”<sup>[16-p30]</sup>经学家俞樾称赞该书“纪英吉利国事甚详。”<sup>[19-p4]</sup>当然该书的基本资料不可能超出《大英国志》的范围<sup>①</sup>。

① 熊月之是较早注意研究蒋剑人的学者,氏著《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一书中曾有相当篇幅对蒋剑人传播的英国民主制度进行过探讨。(参见《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96—100。)

由于蒋剑人的参与翻译,使慕维廉的《大英国志》变得较为准确和典雅,如该书凡例中没有用中国的传统名词去附会翻译,而是准确地用音译法区分了 Emperor、King、President 三者的不同,虽然指出它们分别对应了“皇帝”、“王”和“为首者”的词义,但为了不致引起混淆,仍采用了“恩伯腊”、“京”和“伯勒西敦”这样的音译。“恩伯腊”最初就出现在他撰写的《该撒传》中:“该撒丰功盛德,振古无比,远近大小群臣请上尊号曰:‘恩伯腊’。……丽农山人曰:恩伯腊者,泰西帝号,从古未有,有之自该撒始,与秦王政始皇帝相似,亦豪矣哉。”<sup>[20]</sup>“京”也在他《英志·自序》中出现过:“立国之道大要有三:一君为政,西语曰‘恩伯腊’(中国帝王之称),古来中国及今之俄罗斯、法兰西、地利等国是也。一民为政,西语曰‘伯勒格斯’,今之美利加(俗名花旗国,在亚墨利加州)及耶马尼、瑞士等国是也。一君民共为政,西语曰‘京’,欧洲诸国间有之,英则历代相承,俱从此号者仅列五等爵,上衣租食税而已。”同《大英国志》相比较,此段话只有 President 的译名不同,“伯勒格斯”的译法还出现在蒋敦复的《华盛顿传》中<sup>①</sup>,可见不是偶然的译法。“伯勒西敦”较之“伯勒格斯”的音译,要更准确,这个译名的发明权显然属于慕维廉。19世纪70年代王韬与张宗良一起编译《普法战纪》时,正是在慕维廉、蒋敦复译名的基础上作了更精确的表述:“泰西诸邦立国有三等:曰君为主,如昔之法兰西及今之俄罗斯、地里、普鲁士是也;曰民为主,如今之法兰西及瑞士等国是也;曰君民共为主,如英吉利、荷兰、以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日耳曼列邦是也。君为主者,称‘帝’,西语曰‘恩伯腊’;民为主者,称‘总统’,西语曰‘伯理玺天德’;君民共为主者,称‘王’,西语曰‘京’。”<sup>[21]</sup>对 Parliament 这样比较有把握的术语,蒋剑人可能建议慕维廉直接将其译成“议会”,将“Lords”译成“上院”,“Commons”译成“下院”,指出:“凡制度刑罚,悉由巴力门议会而定,民间自立此会,以增修国政”,“上院人统名比尔士,贵重无比,一世爵,或王自拔擢,一教大长(即大主教)、教长(主教)”,“高门士六百五十六人,皆百姓推选。”较之徐继畲《瀛寰志略》中的“爵房”和“乡绅房”,“上院”和“下院”的译名显然要精确得多,因而至今仍被沿用。关于国会的权限,该书这样写道:“国政必与上下两院询谋佥同,然后施行。其有不善者,国人咸归咎执政。法制禁令,财赋出入,用人行政,王与两院主之,两院亦时稽察各衙门事务,尽所欲言,俾人通晓,即以时政言论,入新闻纸,传布于外,其所议之法,上于王,王弗从,亦不能行。凡纳积捐饷等事,悉高门士为政,上院诸贵人依违而已。高门士权过上院,君相政有不善,即不纳赋积于朝廷。”<sup>[9]</sup>周振鹤先生判断“议会”一语是蒋剑人所创,此词前此文献未曾见,估计后来在《六合丛谈》创刊号中的“议会”是循之而来,英国的“议会”Parliament 和美国的“国会”Congress 两者是有区别的,对两者进行准确的区分,不能不说是蒋剑人的功劳。<sup>[22-p146]</sup>

正因为蒋剑人对“议会”没有误读,因此他从儒家礼教的政治观点出发,在“英志自序”中对英国的议会制极力加以抨击:“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庶人不议。英之议会(即巴力门上下两院),如使行于中国,大乱之道也。……我历观英史,至查尔斯第一为格朗瓦所杀,举朝宴然,无所谓戴天之仇与讨贼之义,不觉发指。……英巴力门知有法不知有礼。法谁出乎?必百姓与一人共为之,民志嚣然悖且乱矣。何法之有?惜乎未有以为国,以礼之说告之也。”他认为查尔斯的被杀是因为新旧二教“纷然聚讼”的结果,他对英王王位可以由女性来继承也特别不以为然:“天位神器不可妄干,明正统重嫡嗣,礼也。英之世系自中国言之,牡朝乱政,异姓乱宗,春秋之法在所必诛。统是三者观之,英之为政亦异乎中国矣。中国贵阳而贱阴,《春秋》尊中国阳之义也。民处田间,地道也;女为天下,坤象也。其教论身后则亦阴教也,彼阴阳易位,且 乎民制其君,教隆于政,女先乎男,几何不以外夷轻中国也。呜呼!奈之何而我中国而为外夷所轻也,吾为此惧作《英志》。”<sup>[23]</sup>表明他写《英志》是为了纠正《大英国志》中的所谓错误观点,以维护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

① 蒋敦复《啸古堂文集》卷五《华盛顿传》称“大伯勒格斯,军国大事咸取决焉。然必与众会议,乃成一。不能独擅威福,四载一易,大众请留,更历四载必易。”

#### 四、《大英国志》的价值及其影响

清初以来,中国人多根据英国人的外表特征而将他们与荷兰人混为一谈。《明史·和兰传》:“(崇祯)十年,驾四舶,由虎跳门薄广州,声言求市”<sup>[24-p870]</sup>。1637年侵扰广州的其实是英国人而不是荷兰人,由于《明史》作为官修史书的权威性,以后印光任的《澳门纪略》、梁廷 的《粤海关志》等都因袭此说。乾隆十二年(1747)官方修纂的《清朝文献通考·四夷考》、1761年大学士傅恒主编的《皇清职贡图》和民间南通人刘长华记述的英吉利等书中<sup>[1-p143]</sup>,都将英国作为荷兰的属国。道光十八年(1838)始竣的《粤海关志》,是由当时著名的学者梁廷 总纂的,但其中卷23仍把《明史》中东南亚的爪哇属国“丁机宜”误作英吉利<sup>[25-p453]</sup>。直到鸦片战后辑录的《犀烛留观记事》仍以为“西南诸夷国, 咭 最为桀骜不驯。”<sup>[1-p238]</sup>

对于中国人来说,英国确实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国家,因为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大门在19世纪中叶最早是被英帝国的大炮轰开的。所以,鸦片战争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了当时中国人认识欧洲的目的就是为了认识英国:“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故今志于英夷特详”<sup>[26]</sup>。日肆猖獗的英国侵略者的活动,特别是沿海地区猖獗的鸦片走私,越来越引起中国朝野的关注,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去认识英国。19世纪30至40年代,有关英国的著述不断地增多,代表性的文章有1832年萧令裕的《英吉利记》;约1834年有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略》上下篇;1834年有汤彝的《咭 兵船记》;1841年有陈逢衡的《咭 纪略》;1844年有汪文泰的《红毛番英吉利考略》等。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注意研究英国的学者是魏源。

魏源在1841年就完成了《英吉利小记》。以后他在林则徐《四洲志》基础上完成的《海国图志》,注意吸收当时学者有关英吉利的研究,如萧令裕所记英国宗教、文字、贸易历史等等内容的《记英吉利》一文,陈逢衡记载英国各地建有大图书馆等内容的《英吉利纪略》等,都被《海国图志》一并收录。《海国图志》中有四卷的篇幅是讨论英国的,并强调全书志南洋、志西南洋、志小西洋、志北洋、志外大西洋,均所以志大西洋;而“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sup>[27]</sup>。魏源称:“自意大利裂为数国,教虽存而富强不竟,于是佛郎机、英吉利代兴,而英吉利尤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sup>[28]</sup>作为一个“日不落”的大帝国,“四海之内,其帆樯无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 削其精华。”“绕地一周,皆有英夷市埠,则筹夷必悉地球全形。故观图但观英夷本国之图,非知考图者也;读志而但阅英吉利本国数卷,非善读志者也。”<sup>[29]</sup>这就是魏源为什么要用如此之多的篇幅描述英吉利的缘故,可以说英国志是《海国图志》全书的核心。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有关英国的知识主要是通过三个渠道获得的。一是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中文著述和鸦片战争前后有关英国的新教传教士若干著述的翻译资料;二是寻访熟知英国信息的经商行医的西方人士或精通海外情事的地方官员;三是通过审俘来了解英国的政治、历史和地理的概况。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中文著述所包含的信息显得比较陈旧,17世纪欧洲的主要大国是西班牙、法国、荷兰等大陆国家,英国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才日益强大起来的,因此无论是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还是《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书,都把英国放在十分次要的地位,相关的介绍都很简略<sup>[30-p233]</sup>。鸦片战争前后新教传教士的一些关于英国与世界的中文著述,虽然是中国人了解英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资源,但这些资料往往都是从现实角度选择资料,其翻译的内容也大多属于摘要性的。而通过经商行医的西方人士和审俘获得的知识更是零碎和不系统的。这就导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完成的一些涉及英国的论著,虽然有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和信息,也不乏有见解的观点,如19世纪40年代完成的徐继畲《瀛环志略》,已注意到自17世纪以来,不断发生英国国王与教士与乡绅间的冲突,斗争的结果是造成了王权下移,逐渐形成绅权对王权的牵制与抗衡之势:“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会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sup>[31-p235]</sup>徐继畲力图通过历史发展来寻找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来源,但限于客观资



料的限制,这些论著大多还是基于表面直观式的描述,很少有细致的分析;且材料又依赖于他人传述的可信性。如1844年汪文泰的《红毛番英吉利考略》基本上是按照旧籍进行排比,其中的材料既不新颖,见解也乏过人之处。

更重要的是,这些论著总不自觉地将天朝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推己及人地加诸英吉利的历史,如称英国和俄罗斯相隔较远,没有交往。这些论著,即使是译著也会多多少少存在着对英国历史理解的主观猜测。即使林则徐主译的《四洲志》虽承认英国“开港通市,日渐富庶,遂为欧罗巴大国”,但仍认为英国国土幅员很小,“土产麦、豆、稻,不敷民食,仰资邻国商贩”,“惟技艺灵巧”,还把英国议会翻译成“巴里满衙门”<sup>[32]</sup>。可见即使是翻译,也会有译者在编译过程中因为传统影响而引起的误读。而且林则徐坚信茶叶和大黄是英国“所一日不可无”的东西,中国人如真的“悉行断绝”,英国人是“无以为生”的<sup>[33-p512,645]</sup>。很显然,上述三个渠道所获得的关于英国的信息,或大多是根据明清以来的各种世界地理或世界历史的中文著述或单篇文章的译本摘编的;或内容太少过于零碎,或资料太陈旧而充满了不少错误。

这一时期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还有着很大的功利性,中国学者所写的关于英吉利的论著,往往重现实的资料而忽视历史的考察。当年梁廷在《兰仑偶说·自序》中已经指出:关于英国的历史和现状“中国人偶有纪述所见闻,亦堪荟萃。然大率详今略古,究未得其立国之所由来。故译字纷歧,且动称千有余年。”<sup>[34-p103]</sup>实在让人感到可疑,他主张编写英国的通史,以增强对西方列强所在国家历史理解的系统性。遗憾的是尽管《兰仑偶说》与同时代其他关于英国的记述相比,要更重视历史的演变,但关于历史的很多资料仍是取自《职方外纪》等一些陈旧的记述。《大英国志》的问世不仅满足了学者系统了解英国历史的这一愿望,而且该书与以往国人编写英国历史书的最大不同,即它不仅是一部“西洋人谭西洋”的文献,而且可以说是第一部由英国学者编译的反映英国朝代兴废的历史,将有关英国历史的最新的、最准确的第一手资料带给了中国读者。使中国人第一次全面地了解了英国的政体演变、历史沿革和文化成就。特别是其中较早和较准确地向中国人系统介绍了英国的议会制度。该书通过对英国科技、地理发现的成果和诗歌、绘画、雕刻等文化成就的介绍,让中国人了解了英国“长技”的由来。第一次知晓了资本主义的政体与军事、经济、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从而大大拓展了中国人的视界,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探索英国历史兴趣,使中国人对英国的考察重点从单纯的现实地理、军事情报转向系统的历史文化的研讨。此书在晚清就深受学人的重视,王韬称该书“自创至今,原本具备,于一邦之制度事实,有所考证。中国史册中所必采。”<sup>[16-p120]</sup>他在自己的论著中有多篇讨论英国政治、历史与外交,在《纪英国政治》一文中指出:“英国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本固邦宁,虽久不变。观其国中平日常间政治,实有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必众论佥同,然后举行。如有军旅之政,则必遍询于国中,众欲战则战,众欲止则止,故兵非妄动,而众心成城也。国君所用,岁有常经,不敢玉食万方也。所居宫室概从朴素,不尚纷华,从未有别馆离宫,迤邐数千里也。”他的结论是“英不独长于治兵,亦长于治民,其政治之美,乎可与中国上古比隆焉。其以富强雄视诸国,不亦宜哉!”<sup>[35-p89-90]</sup>这些结论明显有来自《大英国志》的影响。

慕维廉希望自己这部译作能成为“塾中课读之书”<sup>[2]</sup>,笔者无法确定究竟有哪些学堂曾经用该书作为英国历史的教科书,但此书的确在士大夫群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发行量极大的王西清、卢棣青辑《西学大成》(1895年版)的“卯编史学”、湖南新学书局1896至1897年刻印的《西史汇函》、上海鸿文书局1897年出版的求志斋主人辑的《中西新学大全》都将该书的修订本几乎全篇收录。直到19世纪末仍是受到学界高度重视的英国史的力作,1896年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在推荐西国历史的主要著作中特别推荐了《大英国志》。1897年唐才常的《史学论略》中也将该书列为“通西史”的重要文献<sup>[36-p41]</sup>。1899年徐维则《东西学书录》中称此书“首列维多利亚世系表,与《英兴记》所载足以互勘。其议院、教堂、地理等图尚明爽可观。”此书不仅在中国,而且传入日本后也深受日

本学者的重视,1861年日本青木周弼用读音标注符号翻刻过《大英国志》,流传相当广,著名的日本政治家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都曾读过慕维廉的译本,幕府末期有关介绍以英国为中心的议会制度,尤以此译本的记载为详细。<sup>[37-p64]</sup>

##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史学会编. 鸦片战争[Z]. 第三册. 上海: 神州国光社, 1954.
- [2] 慕维廉. 大英国志. 凡例[J]. 上海: 墨海书院续刻本.
- [3] 慕维廉. 大英国志[M]. 上海: 墨海书院续刻本. 卷一.
- [4] 慕维廉. 大英国志[M]. 上海: 墨海书院续刻本. 卷五.
- [5] 慕维廉. 大英国志[M]. 上海: 墨海书院续刻本. 卷六.
- [6] 慕维廉. 大英国志[M]. 上海: 墨海书院续刻本. 卷七.
- [7] 马吉多维奇. 世界探险史[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 [8] 慕维廉《大英国志》, 墨海书院续刻本, 卷七, 页49, 修订本引文参见《西学大成》“卯编史学上”, 卷七, 页9-10.
- [9] 张广智. 西方史学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 [10] 慕维廉. 大英国志[M]. 上海: 墨海书院续刻本. 卷八.
- [11] 卢梯青等编. 西学大成[M]. “卯编史学上”. 卷八.
- [12] 慕维廉. 大英国志. 自序[J]. 上海: 墨海书院续刻本.
- [13] 慕维廉. 大英国志. 英文序文[J].
- [14] 费正清主编. 剑桥中国晚清史[M]. 中译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15] 胡逢祥、张文建. 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 [16] 王韬. 瀛 杂志. 翁牖余谈[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8.
- [17] 蒋敦复. 丽农山人自叙[J]. 啸古堂文集[M]. 同治七年刊本.
- [18] 蒋剑人. 啸古堂诗集. 王韬序[J]. 上海: 淞隐庐光绪乙酉刊本.
- [19] 俞樾. 春在堂随笔[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4.
- [20] 蒋敦复. 啸古堂文集[M]. 卷五.
- [21] 王韬. 普法战纪[M]. 香港: 中华印务总局同治十二年岁次癸酉秋七月活字版.
- [22] 周振鹤. 〈六合丛谈〉综论[J]. 中华文史论丛. 第61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23] 蒋剑人. 啸古堂文集. 卷七. 英志自序[J].
- [24] 张廷玉. 明史. 和兰传[M].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版. 二十五史本.
- [25] 梁廷 . 粤海关志[M]. 卷二十三. 贡舶三.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 [26] 魏源. 海国图志[M]. 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 卷三十七.
- [27] 见《海国图志》卷五、十九、三十二、五四, 各该部分总叙, 及三十七卷《大西洋欧罗巴各国总叙》。
- [28] 魏源. 海国图志[M]. 卷五十二. 大西洋. 英吉利国. 二. 按语.
- [29] 魏源. 海国图志[M]. 六十卷本. 卷二. 圆图横图叙.
- [30] 龚纓晏. 鸦片战争前中国对英国的认识[J]. 黄时鉴. 东西交流论谭.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 [31] 徐继畲. 瀛寰志略[M]. 卷七.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 [32] 林则徐. 四洲志[M]. 王锡祺辑.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再补编等十二帙. 杭州古籍书店, 1985年影印版.
- [3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M]. 第一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34] 梁廷 . 海国四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35] 王韬. 园文录外编[M]. 卷四.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 [36] 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唐才常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37] 依田 家. 卞立强译. 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Chronicle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Knowledge of the English Histor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ou Zhen-hu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William Muirhead's Chronicle of Great Britain was published by the Mission Press of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in 1856, and it provides a lot of knowledge of English history for the Chine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by Jiang Jian-re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English history and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this book, this thesis points out that the chronicle provided very new and correct first-hand information for Chinese read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o that the Chinese got to know,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hange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ultural achievements in Britain. This book is of great documentary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exchange of historic studies.

**Key Words:** Chronicle of Great Britain, William Muirhead, Jiang Jian-ren, communication of history

本研究系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明清西方文化摄取史研究》(项目批准号200114)的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 周珉]